

# 新冠疫情仍在严重拖累全球经济

“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举行，与会人士呼吁——

## 防范世界经济风险还需加强合作

本报记者 禹洋 仇莉娜

一段时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被部分试图以“躺平”换取经济增长的国家淡化，仿佛“只要不主动提，影响就最小”。不过，随着新一轮疫情持续不断冲击，一些国家不得不在“防控”和“解封”间来回横跳，疫情对其经济增长的拖累依然严重。

8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过去4周全球报告的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增加了35%。仅在过去一周，全球就有1.5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世卫组织称，随着北半球天气的变化，预计未来几个月病毒传播的风险只增不减。

这个消息对有些国家可谓雪上加霜。8月17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沃伦斯基对外承认，该机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够及时且缺乏清晰的行动方案，“需要对一些相当戏剧性、公开的错误负责，从病毒检测到疫情数据再到信息沟通”。沃伦斯基这番表态聊胜于无。毕竟，美国由于应对疫情失败已导致超过100万美国人死亡，科研实力和医疗技术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对此多少要有所交待。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伤害仍在持续。8月15日，美国8月份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降至-31.3，较7月份的11.1大跌逾42个点，成为该指标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月度跌幅。这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商业状况显著恶化，更被市场视作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实质性衰退的重要征兆。该指数的分项数据显示，当月员工工作时长指数跌17.4点，员工数量指数跌了10.6点。有分析指出，这表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在向深层次发展，新冠后遗症正严重削弱美国部分群体的工作能力，进而发展为美国劳动力供应不足的结构性问题阻碍经济增长。

近期披露的诸多研究表明，新冠后遗症对欧美就业市场的影响或将长期存在。7月19日，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成年人中约有五分之一仍带有“长新冠”(long-covid)症状，大约有100万美国人受相关症状(主要包括呼吸短促、认知功能障碍以及疲劳)拖累而被迫离开就业市场。8月4日，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自6月5日至7月2日，英国有180万人正在承受“长新冠”症状的影响。数据显示，“长新冠”患者在英国近期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失业并且不积极寻找新工作的人口)中的比例升至5%，去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为2.4%。英国财政研究所7月份的一份报告则称，“长新冠”可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种非常持久的影响”。

日本疫情更不容乐观。疫情恶化正在让日本医疗系统发生挤兑。8月15日，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等京都府14家医疗机构发出联合声明称，京都府处于“本可以挽救的生命挽救不了”的医疗崩溃状态。声明警告，感染新冠病毒“绝对不是简单的感冒一样的病”。8月19日，日本报告新增病例超过26万例，创下疫情以来新高。8月21日，日本政府确认首相岸田文雄感染新冠病毒。有分析指出，由于日本经济动能不足，日本政府在应对严重疫情时并没有采取措施限制经济活动，然而“躺平”却让日本经济面临疫情反弹导致消费和生产承压，这种结果怕是让日本的决策者始料未及。

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不同国家的表现耐人寻味。欧洲近期屡屡警告高通胀、高温和能源危机，日本则相对沉默，而美国当局依然以失业率处在历史低点为证据，坚称美国并未陷入衰退。不过，美国一些市场机构对就业的看法与美国政府相左，近期屡屡质疑美国非农数据可靠性，而一些知名的财经博客则不无讽刺地提到，或许要到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才会承认劳动力市场不容乐观的事实。



戴相龙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当前，主要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正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弊端日益突出、美国政府金融失信风险蔓延、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扩大亚洲地区金融风险等方面。

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同时，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应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应加快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增强中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抓紧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融资制度、现代金融监管制度，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爆发，波及东亚多个国家，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这场危机暴露了相关国家金融体系的缺陷，促使亚洲国家对经济政策、发展模式、金融体制及产业结构等进行调整。同时也促使国际社会对现行的世界经济、金融体制进行反思与改革，影响深远。

8月19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与会嘉宾一方面回顾了危机发生的内外部原因、主要受影响国家的应对措施和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围绕当前全球经济主要风险点和化解风险提出建议，呼吁以史为鉴，加强团结与合作，避免冲突与分裂，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 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部分国家长期经常项目存在逆差、过早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实施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早期应对危机政策失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措施不当等一系列内外部原因导致危机发生。同时，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是根本原因之一。与会嘉宾认为，推动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助于降低下一场危机发生的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现场。(资料图片)



朱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从亚洲金融危机来看，经济金融危机其实是6种不同根源的危机：一是实体经济危机，主要是由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等引发；二是金融危机，当流动性发生逆转时，资金链断裂，形成金融危机；三是政策危机，包括危机前的宏观政策失误以及危机开始时应对政策的失误；四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金融危机；五是外部资金变动引起的危机，大部分是因为美联储利率变化引起外部冲击；六是系统危机，如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当危机来临时，判定危机的性质十分重要。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6种风险都在积累、都在高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技术性衰退，美国股市处在百年高位，全球政府债务也是如此。在高债务、高股价、高泡沫的情况下，金融体系非常脆弱，政策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因此，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及亚洲区域之间的协调，在今天这个时点仍有重要意义。



杰弗里·萨克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源于恐慌，且具有传染性。但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可靠的、类似“最后借款人”的国际机构，让出现危机的国家可以寻求帮助。

很多国家都有通胀风险，欧洲央行正在收紧信用，这可能是新一轮危机的开始。当前，已经出现一些违约行为，未来几个月，可能有更多国家面临违约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

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好渠道作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多边国际金融体系非常有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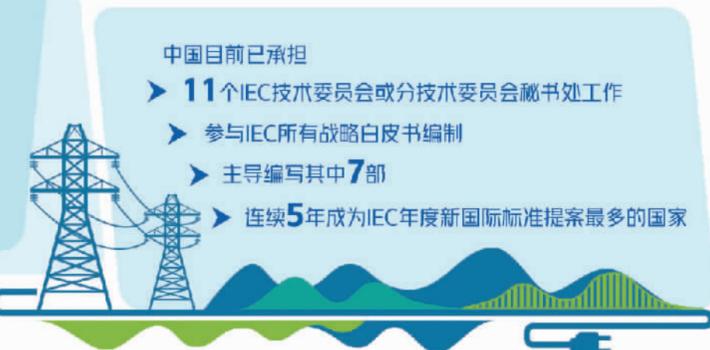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就在反思为什么没有好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断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一定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可靠的多边体系，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不稳定、不确定和脆弱性因素。

(嘉宾观点由本报记者 禹洋整理)

## 中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国际标准体系——

# 为国际标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孙昌岳



8月20日，IEC国际标准促进中心(南京)在2022国际标准化大会上成立，这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中国设立的首个分支机构，对于拓展IEC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应用范围、推动国际标准认证规则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将为世界标准化工作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方案。

IEC主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印彪表示，中心将定期举办IEC国际标准化会议及相关活动，编写国际标准化研究报告，将IEC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推向深入。中心还将服务更多中国专家、中国企业参与IEC工作，为中国企业和专家开展国际标准化研究、项目孵化、标准研制与应用等提供指导和服务，支持制定更多由中国主导的碳排放等领域国际标准。

“标准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国际交流、便利贸易往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目前，国际标准与合格评定互认体系已覆盖全球经济总量

95%以上的经济体，影响着全球80%以上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舒印彪说。

IEC是世界三大国际标准组织之一，被誉为“电工领域的联合国”。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国的2万多名专家参与IEC各项工作，累计发布国际标准1万余项，服务范围覆盖能源、交通、医疗等诸多领域。

近年来，IEC多措并举，以高标准助力全球开放合作和创新。例如，严选来自中国等12个主要国家的代表，成立IEC治理改革小组，持续优化管理流程；联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率先将重症监护呼吸机等电子医疗设备相关的33项国际标准无偿向国际社会公开；启动未来十年战略规划工作，将碳中和、能源转型等主题列入战略规划内容，培育形成大量国际标准。

中国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积极推广应用国际标准，也是IEC常任理事国，目前已承担11个IEC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参与IEC所有战略白皮书编制，并主导编写其中的7部，连续5年成

为IEC年度新国际提案最多的国家。从2012年至2021年，中国承担的IEC技术机构秘书处从5个增长到12个，提出并发布的IEC国际标准从62项增长到368项。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对于全球能源转型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大会期间，IEC提出，由中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国际标准框架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中国新能源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风电、光伏、锂电池等产业规模、市场规模均稳居世界第一，具有引领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产业和技术优势。IEC表示，由中国主导，统筹开展新型电力系统国际标准框架体系研究和标准国际化战略研究，有助于全球能源转型。

据悉，IEC正在将中国提出的“双碳”、零碳电力系统主题列入战略规划，未来5年，将在能源低碳领域发起成立1个至2个新技术委员会，培育10项到20项国际标准。

积极参与能源低碳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纲表示，推动“双碳”目标下标准化创新发展，应结合行业需求，促进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优化标准供给，构建“科研—标准—产业(工程)”三位一体的大科研布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薛禹胜表示，标准体系的层次、维度、结构及颗粒度设计极为复杂，必须在规模化和创新性之间进行协调，“双碳”目标及能源转型涉及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众多领域，是一个‘系统的系统’。‘系统的系统’呼唤‘标准化的标准化’，研究相应的标准化体系规划与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表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都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承受了美元外债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美国金融失信风险蔓延也增添了新的全球金融风险。

“与25年前相比，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逐步下降，美国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美国经济实力很难支撑美元的地位，但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仍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戴相龙认为，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国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很难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防范危机的有效途径。2000年，第9届东盟—中日韩(10+3)财长会议上，各国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清迈协议》标志着亚洲货币合作新时代的开始，并在此后取得比较大的进展。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金融合作逐渐失去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亚金融、货币合作似乎已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议题。

余永定认为，当前亚洲的域内和域外经济关系、金融问题同25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挑战，亚洲国家应努力深化始于25年前的区域金融合作，例如通过亚洲货币单位(即“亚元”)等设想，形成货币间较为稳定的汇率，创建区域共同货币，减少过度依赖美元带来的风险。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要有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退而求其次，需要多个币种在国际贸易投资中发挥作用，维持正常运转。

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原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桥直提出了建立亚洲数字共同货币的畅想。他认为，数字货币不需要真的印钞，依托各成员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建立亚洲数字共同货币相对比较容易。这一体系可以降低一揽子货币的外汇风险，也有助于各成员国应对外部风险和冲击。此外，相关债券还可以扩大亚洲债券市场，融资也可以在亚洲国家之间作为国际公共债务使用，对未来亚洲金融合作有重要意义。

### 防范风险需要加强合作

当前，多国面临经济复苏乏力、通胀高企、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等风险。如果风险不断叠加，不排除出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的可能。与会嘉宾认为，各国应提高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建立更加协调的国际金融体系。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赫里萨尔·阿兹里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危机出现后，中国、日本、韩国都加强了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东盟—中日韩(10+3)也设立了特别机制，加强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对话，这些都是亚洲金融危机带

来的启示和改变。

余永定强调，东亚国家在地理上是近邻，在经济上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尽管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东盟—中日韩(10+3)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东亚地区的繁荣，东亚国家应该看得更加长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大国要带头提供更多好的国际公共产品。东盟—中日韩(10+3)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都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精神。这种好的多边主义与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就在反思为什么没有好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断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一定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可靠的多边体系，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不确定和脆弱性因素。他认为，亚投行就是很好的尝试，为参与者提供了合作渠道和平台。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区域一体化加强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我们最近在对一些中国企业进行调研时发现，很多企业对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很有信心，包括服装、钢铁等传统行业，高科技企业，高端制造业以及医药企业等，对在东南亚国家投资非常积极。这也是区域一体化加强的表现”。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局副局长艾卡思表示，过去25年，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所提升，亚洲地区也建立了更加强健的区域金融安全体系。当前，亚洲面临新的风险，必须更全面地提升经济韧性，增强各国经济转型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些挑战是亚洲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各国正面临着全球经济脱钩、产业链脱钩的危险。在大国博弈中，大国常使用经济手段来遏制对方，其中包括对方国家的银行从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中排除。假如一个经济大国被排除在SWIFT之外，就意味着大部分国际结算不能进行，就掐断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严重损害全球供应链。他认为，经济要平衡发展，国际金融体系不能脱钩，全世界尤其是东盟—中日韩(10+3)要加强沟通与合作。